循环、下降与僭主
——1848 年法国革命的政治哲学批判

王 志 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北京 100026)

摘 要: 革命(Revolution)的原意是天体周而复始地循环,革命的现代含义与其古典含义正好相反。现代革命是颠覆过去的历史“终点”和创生新纪元的“起点”,同时意味着面向未来不断进步的历史运动。但1848 年的法国革命经历了一个不断“下降”和“循环”的政治怪圈,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出现使得“共和制在欧洲何以可能”成为 19 世纪后期欧洲知识分子必须处置的时代之问。将这一问题放在古今之变的政治哲学语境中观察,会发现共和精神从“混合”与“均衡”到“美德”与“平等”,再到“激进”与“恐怖”的古今意义倒转,并因此呈现出更加丰富的理论张力。现代共和内含的平等主义和“社会革命”诉求是其无法克服内在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努力以唯物史观揭破 1848 年法国革命之谜,并为人类解放寻找更加理想的政制。“社会共和”超越“政治共和”的关键就是完成了“社会解放”和“社会的解放”的双重任务:一方面废除了市民社会的“内部等级制”;另一方面废除了政治国家特别是其最高形式——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马克思以“社会共和”作为破除法国共和制面临的革命循环和下降、帝国与僭主怪圈的政治哲学方案。

关键词: 1848 年法国革命;古今之变;社会革命;社会共和

中图分类号:K565.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3)06-0138-13

1848 年的欧洲革命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815 年的欧洲君主们相信法国大革命伴随着拿破仑的战败和维也纳体系的建立已经彻底被“神圣同盟”的永恒秩序封印。但 1848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迅速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波及范围甚至超过法国大革命。虽然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迅速被镇压下去,但在它的冲击下欧洲君主制联盟建立的维也纳体系摇摇欲坠。与法国大革命一样,1848 年革命成为欧洲从中古走向现代的关键转折点之一。最有戏剧性的是革命的中心——法国,在短短的四年间经历了二月革命、六月起义、保皇党的议会共和国、废除普选权、路易·波拿巴政变等一系列风云变幻,历经从君主立宪到共和制又到第二帝国的剧变。马克思、恩格斯、托克维尔、雨果、孔德等一众知识分子亲历了这戏剧性的一幕。1848 年革命的失败,在不同的方向上给他们分别留下深深的困惑。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以为革命会趁势而起,一举推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结果却是第二帝国的诞生以及之后漫长的革命沉寂;托克维尔哀叹共和制在法国的难以维系;雨果不能理解为什么法国人民会抛弃“人类文明的顶点”法国议会,而选择路易·波拿巴。这一代知识分子并没有看到共和制在欧洲的普遍建立。共和制在欧洲是否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悬置的历史之问。1848 年革命是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亲身经历的欧洲“大革命”,他们对于这场革命的政治哲学思考,是唯物史观第一次直切现代革命的历史现场,对于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哲学思想有着非常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收稿日期:2023-08-18
作者简介:王志强,男,安徽滁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对启蒙思想的综合与重建研究”(项目编号:20BZX014)。

一、革命、循环与共和

革命(Revolution)一词本身就呈现出“古今之变”的某种要义。革命的原意是天体周而复始的循环:“Revolution 的早期用法意指时间和空间上的旋转循环运动”①,比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7 世纪运用到政治领域时则意味着“恢复的法定执政当局”。但是法国大革命使得“革命”具有了现代含义:“Revolution 过去‘恢复的法定执政当局’之意涵……已经被‘必要的革新’、‘建立新秩序’的意涵所取代……在 Revolution 的词义里,‘创建新秩序’与‘颠覆旧秩序’一样重要,毕竟那是 revolution(革命)为何会与 rebellion(叛乱)以及 palace revolution(宫廷革命)有所不同的原因(palace revolution:更换领导者,而不是变革社会体制)。”②革命的现代含义与其古典含义正好相反,“革命”不再描绘周而复始循环的“圆圈”,革命首先是一个“点”,它是颠覆过去的历史“终点”,又是创生新纪元的“起点”。革命是从这个点出发的一条“射线”,意味着面向未来不断进步的历史运动。所以革命的古典叙事意味着欧洲政治体制的循环性,但法国大革命以后其具有了不同的含义,现代革命叙事是一往无前、彻底革新、开辟新纪元的历史前进。但革命观念本身内涵的这种颠倒,注定了现代革命需要面对两种叙事的内在张力。

从“七月王朝”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按照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叙事,法国经历了君主制、民主制、寡头制和僭主制的依次变换。“七月王朝”是典型的君主制,“二月革命”后到 1850 年废除普选权之前是民主制,1850 年 5 月 31 日废除普选权之后是“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寡头制统治,1852 年路易·波拿巴政变推翻共和制后,则建立了典型僭主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这种政体变迁对于现代革命来说是一种风云变幻,但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来说则是一个颇为传统且核心的理论主题。如古罗马的波里比阿斯认为国家政治的变迁遵循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闭环规律,而从古典迈向近代的马基雅维利也将其描述为一个君主制、贵族制、寡头制和民主制的循环。在他们看来每种政体的内在矛盾推动它们依次更替,而恒定的人性则决定了这种更替的恒定循环。没有哪一种政治制度是永恒的,政体循环本身构成了人类政治的恒定形态。

而在更早的讨论中,这种“循环”被呈现为一种“下降”。西塞罗认为:“每一种政府形式面前都有一条陡峭泥泞的道路,会导致一个与它邻近的腐败形式。”③亚里士多德认为君主—僭主,贵族—寡头,共和—民主构成独立的堕落循环。柏拉图则在《理想国》第八章中描述了一个不断下降的政体堕落:理想政体、荣誉制、寡头制、民主制、僭主制的依次堕落。而这种下降的悲观,更早可以追溯到赫西阿德在《工作与时日》中,将人类历史描述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黑铁时代的不断堕落。“循环”将各政体视为必然过程的并列环节,“下降”则对各政体的优劣存有明确的判断,并对历史存有“败坏”与“堕落”的悲观忧思。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将 1848 年法国革命后波云诡谲的三年政治变幻描述为一个不断“下降”政治路线:从无产阶级的社会共和国堕落为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再堕落为保皇派“秩序党”所操控的保守立宪共和国,最后竟堕落为路易·波拿巴称帝的“法兰西第二帝国”,“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④。

1848 年法国革命后的“循环”与“下降”,似乎构成了一个古今同构的政治哲学叙事。在关于“下降”的古典解释中,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分析最为详尽,他认为“下降”来自每种政体将自身的原则推至极致导致瓦解:以财产为原则的寡头制由于过度追求“财富原则”,导致两极分化和贫富对立。人数众多

---

①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411 页。

②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第 415 页。

③ 西塞罗:《国家篇 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37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92 页。

的“无产贫民”与少数垄断财富和政权的统治者之间尖锐的阶级斗争,被城邦的流氓无产者领袖“雄蜂”利用,他们以平民保护者的身份获得无产者的支持,推翻寡头制的财产资格垄断,建立一切平民获得公民权的民主制。但民主制过度追求“自由原则”,热衷于放任的欲望和私人生活,而将公共政治让渡给“雄蜂”来为自己提供“保护”,结果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导致了极权政治的需要,僭主政治“只能是从‘保护’这个根上产生的”。“雄蜂”把自己打扮成“领导一个派别反对富人的那种领袖人物”,“掠夺富人,把其中最大的一份据为己有,把残羹剩饭分给一般平民”①。随后他利用这笔财富建立起“一支警卫队来保卫他这个人民的保卫者”,进而“打倒了许多反对者,攫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由一个保护者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僭主独裁者”②。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路易·波拿巴,会发现他和柏拉图描绘的“雄蜂”如此相似。几乎毫无政治影响力的流亡者路易·波拿巴正是借助“六月起义”后尖锐的阶级斗争,以拯救者的身份通过普选成为欧洲第一位民选总统,“他毫不否认他倾向革命党人、倾向社会主义的历史,但把自己打扮成全国和解及阶级联合的捍卫者”③随后在总统与“秩序党”控制的议会之间的权力斗争中,他巧妙地利用寡头派废除普选权的机会,彻底孤立了政治势力颇大的“秩序党”寡头议会。路易·波拿巴放任“秩序党”的寡头议会在 1850 年通过限制选举权法案废除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普选权,他知道这种反动操作必然激起普遍的民众愤怒,他对心腹表明这番操作的目的:“当议会悬于绝壁时,我将割断绳子。”④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提议废除这项选举法案,重新恢复普选权,“他似乎成为反对反动议会的民主代表”⑤。这是他得以在 1852 年轻松发动政变废除议会共和国的重要政治基础。路易·波拿巴的十一月政变只遭到零星的抵抗,而“恢复皇帝称号,立路易·波拿巴为法国人的皇帝”的决议,却在法国的全民投票中获得压倒性支持:“举行新的公民投票,选民应对是否恢复帝制表态,投票 7824000 人赞成,反对者仅 253000,另有 205500 人弃权。”⑥

在柏拉图的古典解释中,政体下降的动力是每种政体内在原则的过度推行,城邦中每个阶级只遵循本阶级的利益和原则并在掌握政权时将其推至极致,进而导致无节制的阶级斗争,而这种激烈的阶级斗争最终导致政体的不断颠覆。缺乏缓冲的党争、倾轧和内讧最终造成政变(革命)和政体的瓦解。法国“二月革命”前后的政治变动表现出斗争双方矛盾激化后共同退出历史舞台的特有规律,托克维尔就曾指出“在法国,历届政府总是犯把支撑点放在一个阶级的排他利益和利己心上的错误”⑦。革命前“七月王朝”和主张改良的“王朝反对派”之间斗争日益激烈:“政府和反对派好像要一起努力把事态推向最后很可能使全体人民受害的极端。”⑧矛盾升级的结果引发了“二月革命”,而随着共和国的建立,“王朝反对派”和菲利普王朝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托克维尔称之为:引发革命的人,在革命中失去了权力。“二月革命”成功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激烈斗争引发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结果是无产阶级被镇压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心,资产阶级共和派取得军事胜利后,却先在总统选举中败给了路易·波拿巴,又在立法议会选举中一败涂地,此后资产阶级共和派作为一个派别也消失了。在之后的立法议会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山岳党”和寡头保守势力“秩序党”围绕罗马问题和普选权在议会内外展开激烈斗争,以及“秩序党”占据优势后“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彼此分裂和权力争夺,最终被路易·波拿

---

①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347—348 页。

② 柏拉图:《理想国》,第 349 页。

③ 路易·吉拉尔:《拿破仑三世传》,郑德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74 页。

④ 路易·吉拉尔:《拿破仑三世传》,第 98 页。

⑤ 孙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7 页。

⑥ 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42 页。

⑦ 托克维尔:《托尔维尔回忆录》,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69 页。

⑧ 托克维尔:《托尔维尔回忆录》,第 47 页。

巴利用作为发动政变推翻共和制议会的机会,随着“法兰西第二帝国”取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山岳党”和“秩序党”也一起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心。这呈现出1848年法国革命特有的“革命辩证法”:每个阶段的矛盾不是以斗争双方中某一方的胜利得以解决,而是伴随政治下降到一个新的形态,斗争双方一同被历史扬弃。

激烈的矛盾推动政治形态转变,亚里士多德给出的破除政体循环困境的古典政治哲学方案,是尽量建立和维系“共和制”政体以抑制过于激烈的阶级斗争,共和制混合民主制的自由原则、贵族制的才德原则和寡头制的财富原则,一个混合良好的共和政体可凭借内在的均势而实现稳定。① 城邦作为共同体接受内部各阶级的异质性和共存性,并且兼顾各方的利益平衡,防止某一方的原则过度推进,以实现政制的平稳和持续,“共和政体中的各个因素倘使混合得愈好愈平衡,这个政体就会存在得愈久”。② 这种混合和平衡的共和制破解政体循环也是整个古典传统的共识,如古罗马的西塞罗强调:“政府形式的不断变化和变化次序而来的周期性革命和轮回性的进程。一个智者应当熟悉这些变化,但是,当这些变化构成威胁时,……我认为第四种政府形式最值得推荐——这种形式是由我一开始就提到的那三种形式[引者注: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规定恰当的混合体”③。马基雅维利也认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而兼有众家之长的政体形态,认定它比较能够长治久安,因为一个城市同时具备君主、贵族与民主三种体质,彼此可以相互制衡。”④

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共和制”这个古典政治哲学的稳定政体方案,恰恰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近百年中存续时间最短且最不稳定的政体。“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从建立到拿破仑政变,只有短短7年,其间还经历了雅各宾政变、热月政变、果月政变、雾月政变等一系列血雨腥风。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更仅维持了4年。与之相对比,拿破仑及其“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统治维持了16年,复辟的“波旁王朝”维持了15年,随后的“七月王朝”和“法兰西第二帝国”则各自稳定维持了18年。古今同构的政治哲学叙事在这里出现了裂缝,如果说在古典政治哲学叙事中,共和制是动荡和循环的终点的话,法国大革命后,共和制却是循环的起点。

二、古今共和与社会革命

与革命含义的古今倒转类似,共和制降临法国时所呈现的精神与古典共和精神的混合均衡理念完全相反。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内涵有激进主义的精神,虽然法国革命在语言上不断重复古罗马共和国的各种精神符号,但其恰恰否定了古典共和精神的温和性。法国的激进共和派改变了共和精神的“混合”与“平衡”的古典内涵,罗伯斯庇尔主张:“共和国的灵魂是美德、平等。”更重要的是法国的激进共和派更是将共和主义的美德与极致的革命暴力相联系,罗伯斯庇尔主张革命中共和国的“原动力既是美德,又是恐怖”⑤。雅各宾派的共和专政呈现不断加速的暴力循环:先消灭反动派、再消灭反对派、最后自我消灭,这种激进的暴力循环完全抛弃了古典政治哲学所推崇的“审慎”与“平衡”原则。在法国激进共和主义那里“共和主义的美德”作为法国革命的基础,其“高度纯洁性和革命目标的崇高性……使我们用真理压倒欺骗,用公共利益的权利压倒个人利益”⑥。共和精神从“混合”与“均衡”到“美德”与“平等”,再到“激进”与“恐怖”的古今意义的倒转,之所以呈现了一种“古代文明与现代野蛮”的悖论,

---

①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03—205页。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15页。
③ 西塞罗:《国家篇 法律篇》,第37—38页。
④ 马基雅维里:《论李维罗马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6页。
⑤ 《罗伯斯比尔选集》,王养冲、陈崇武选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235页。
⑥ 《罗伯斯比尔选集》,第235页。

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阐释。

首先是法国革命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性。“共和”的古今意义倒转以及伴随其而来的暴力加速循环,与革命(Revolution)的古今义变相关。因为法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是形而上学化的,托克维尔指出:“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础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所谓18世纪政治哲学,严格说来,就包含上述的那个唯一观念中。”“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①。法国革命意识形态的这种形而上学性,使得“共和”脱离了它原初古典政治实践的经验语境,变成一个现代理论的抽象概念。柏克和托克维尔一样关注到法国现代政治思想的这种形而上学抽象,及其对政治实践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柏克指出当以形而上学的观念论面对平衡权利的政治实践时,“哲学式的革命”会把“语言上和笔头上的不宽容转化为一场打击所有权、自由和生命的迫害的那种权力”②。“语言上和笔头上的不宽容”留在理论领域是深刻的,一旦直接转变成政治权力则必是血雨腥风。正如傅勒反思法国大革命时所指出的:“一切论争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为观念和权力之间已经没有插足的空间,政治不再有别的场所,只有:一致认同,要么就是死亡。”③法国革命叙事的这种形而上学性,意味着激进革命派误用《形而上学篇》的方法解决《政治学》的问题,误用“理论智慧”的逻辑处理“实践智慧”的问题,用纯粹理性的思维处理实践理性的问题,这是哲学方法论上的根本错误。

其次是法国革命叙事政治化的“二元对立”及其背后的“一神教”传统。在现代革命一往无前、彻底革新的线性历史进步主义叙事中“共和”也具有了新的历史叙事。在法国的共和派那里,共和制不再是和其他政制平行比较中的一种政制,而被设定为在历史进步中通过革命才能达到的神圣目标。如雨果就将其称为人类文明的顶点:“从米拉波开始,在世界上,在人类社交活动中,在人类文明中,就出现一个顶点、一个中心、一个热点、一处高峰。这高峰,便是法国议会论坛。”④这种目标化的历史叙事,使得“共和”与其他政体和阶层利益的关系不再是“混合”和“平衡”,而消灭、取代的政治“二元对立”关系。在法国激进共和主义那里,所有的差异都被放在革命政治的唯一标尺上加以衡量,在傅勒看来甚至“所有道德的或知识的问题都成了政治问题,人类的灾难没有不需要政治办法来解决的”,这使得“整部大革命史被深深打上了一种基本的二元对立(dichotomie)烙印”。⑤ 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政治化叙事,似乎革命是个二维世界,只有革命与反革命、爱国与叛国,只有人民与谋反的贵族。

这种政治哲学上的“二元对立”叙事无须归因于近代哲学,它有一个更加直接的来源,即基督教。托克维尔对此说得很清楚:“法国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⑥基督教与古希腊宗教的关键区别在于,基督教是“一神教”,而古希腊和罗马的宗教是“多神教”。“多神教”虽然也有主神,但其本身就倾向于一种“均衡的秩序”,而“一神教”则大多建立起“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上帝—魔鬼、善—恶,“我们还是看见善恶两种根源的学说到处出现:邪恶的撒旦和善良的基督对立着”。⑦ 法国大革命虽然在内容上反对宗教势力,但是其在精神结构上无疑继承了“一神教”的结构,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大革命本身成为一种新宗教。”⑧古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共和制的文明背景是“多神教”的赫西俄德的《神谱》与万神殿,它的原则是混合的也是秩序和平衡的。而法国大革命的激

---

①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0、241页。

② 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47页。

③ 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5页。

④ 雨果:《一桩罪行的始末》,丁世忠、涂丽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页。

⑤ 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第39、76页。

⑥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52页。

⑦ 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6页。

⑧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53页。

进共和主义是“一神教”的“共和国”,罗伯斯庇尔强调:“必须只有一个唯一的意志。这个意志应当是共和主义的。”①而在这个“唯一的意志”面前充满了“革命与反革命、爱国与叛国,人民与谋反的贵族”的二元对立。

再次,是政治哲学叙事结构倒转导致的“社会革命”的要求。在古典政治哲学中,人与人的差异是“自然秩序”(Physis),共和制城邦是“人为约定”(Nomos)的共同体,人们只有在参与共和制城邦的公共政治生活时,才享受公民的平等,即平等的城邦政治权利。所以作为“自由人自我统治”的共和制城邦承认和接受“自然”差异和不平等,作为“约定”它只保证“自由人”的政治权利平等。从梭伦开始,保护富人财产不被平民强分,同时保障平民不因债务失去自由民身份,成为共和制城邦最重要的“平衡”原则。这个原则意味着城邦承认社会财产的不平等,但要保护政治权利的平等。但现代契约论“自然状态”的起点是抽象“原子个人”。由于“原子个人”是一个观念,而不是现实,故其基于概念的同一性而具有先验的绝对平等性。现代契约论的“自然状态”并不是“自然秩序”,而是一个“人为约定”的观念。现代契约论从先验的“天赋人权”出发肯定“原子个人”的“平等权利”,这就必须解释一个矛盾:每个在现实中经验着各种不平等的现实个人,如何理解和面对这个先验和抽象的“平等”。作为“人为约定”的“自然状态”被误认为“自然秩序”。既然“自然状态”/“自然秩序”中的人是平等的,那么就是“文明状态”/“人类社会”/“人为约定”导致了现实不平等。在这一逻辑下所有的现实中的差异都被解释为不平等,且现实的社会是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所以需要批判和改造现实社会,“解放”因此成为现代革命的叙事目标②。这就是“革命”的现代意义将颠覆性引向共同体内部,即从卢梭开始的在“自然状态”与“理想共同体”之间加入现实性批判环节的现代政治哲学叙事。

这种平等主义的政治哲学逻辑,决定了现代革命在本质上,不仅仅是“政治革命”而且必然要推进到“社会革命”。在古典政治哲学中,“社会问题”在政治视域之外或仅作为政治变动的外在变量,而在现代政治哲学中“社会问题”是中心问题之一。夏多布里昂在对比了希腊的共和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时强调两者的本质差异是“奴隶”问题:“古时的共和国是如何维持下来的呢? 通过奴隶。我们的祖先为何会生活得如此自由? 通过奴隶。实际上,没有奴隶就不可能领会改依照什么样得原则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因此,现代制度其实已把我们当中的所有共和国排除在外。”③马克思也指出“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④ 所以现代革命面对的“社会问题”是已经或正在获得政治解放的,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无产阶级,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面临的贫困、压迫和剥削,并要求实现“社会解放”的革命诉求。阿伦特把这种变化追溯到英国革命:“英格兰内战为十八世纪革命中本质上全新的事务埋下了大量伏笔:平等派(Levellers)的出现,一个全部由下层人民组成,其激进主义与革命领袖发生冲突的党派的形成,都清晰勾画了法国大革命的进程。”⑤夏多布里昂在《试论古今革命》中强调:“现代政治作家的作品导致了一场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平民国家(popular states)在王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⑥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政治革命,但是社会革命已经蕴含其中,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指出的:“这场革命产生了超出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1789 年在社会小组中开始、中期以勒克莱尔和卢为主要代表、最后同巴贝夫的密谋活动一起暂时遭到失败的革命运动中,产生

---

① 《罗伯斯比尔选集》,第 297 页。

② 参见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9—20 页。

③ 夏多布里昂:《试论古今革命》,王伊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08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65 页。

⑤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第 32 页。

⑥ 夏多布里昂:《试论古今革命》,第 290 页。

了共产主义的思想。1830 年革命以后,在法国,这种思想又为巴贝夫的友人邦纳罗蒂所倡导。这种思想经过了彻底的酝酿,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①1848 年的法国革命已远远超出了政治革命的范畴,“社会革命”成为其最鲜明的旗帜:“二月革命不但是‘无产者’促成的,而且是具有自觉性的社会革命。其目的不仅是建立共和国,而且是要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其领导人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②在马克思看来“社会革命”就是要消除“市民社会”内部的等级和不平等,即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权,实现“社会解放”。所以马克思清晰地指出共和国只是无产阶级自身革命解放的“基地”,但不是解放本身。而“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是:“手持武器的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盖上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③

托克维尔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指出:“法国大革命废除了所有的特权,破坏了排他性的专属权,但只把财产所有权保留下来。”到了 1848 年革命之前,政治平等化之后的社会对财产和所有权的革命要求已经日益激进。所以在 1848 年革命爆发以前他痛心疾首地在议会强调法国睡在活火山上,面临着“这个国家的最严重的革命”:“请大家看一看工人阶级当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大家没有看到他们的政治激情已经是社会性的了吗?你们没有看到这种情形正在逐渐在他们的观点和思想中扩散,他们要推翻现行的统治、内阁和政府,而且要推翻社会,使社会今天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发生动摇吗?……虽然我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和怎样引起最可怕的革命,但它们迟早要引起这种革命!”④托克维尔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七月王朝”面临的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在性质上的差别,因为“二月革命的哲学,就是各种社会主义理论”,所有 1848 年革命的这种特殊的“社会革命”的性质与法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形式的矛盾最终将暴露出来,“六月起义”的爆发证明了托克维尔的预见。

由于“六月起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公开的战斗,所以无产阶级既没有充分的革命理论准备,也没有充分的舆论准备和物质准备。巴黎工人的主要对手是资产阶级共和派,但他们的社会革命诉求,没有得到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支持,最终资产阶级共和派授权的“卡芬雅克专政”暴力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巴黎工人的“社会革命”诉求没能联合其他社会阶级,反而成了整个社会其他阶层联合镇压的对象。

“社会革命”是比法国激进共和派的“政治革命”更进一步的革命诉求,对于当时的法国人来说,“六月起义”是两个激进派之间的竞速革命。所以“六月起义”的爆发和卡芬雅克的血腥镇压,唤起了法国各阶层对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激进共和派统治时期的“恐怖回忆”,这次他们面对的两个选项是:激进共和派一如既往的血腥屠杀,或者比激进共和派更为激进的“社会革命”派的工人。结果这场竞速革命没有胜利者,“继之而来的将是对自由制度的恐惧,可能还有对这种制度的厌恶”。⑤ 这导致整个社会的保守化倾向,人们对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同时感到恐惧。⑥ 因此,六月起义后整个法国趋向保守,在随后的总统选举和立法会选举中,选择了波拿巴主义和保守的“秩序党”。

现代共和内含的平等主义和“社会革命”诉求是其无法克服内在矛盾。法国革命的这些上述特征,使得法国大革命以后建立的现代共和制始终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因此共和制从古典时代破解循环的方案,变成法国大革命以后动荡和循环的起点。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20 页。

②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75 页。

④ 托克维尔:《托尔维尔回忆录》,第 39 页。

⑤ 托克维尔:《托尔维尔回忆录》,第 217 页。

⑥ 雨果:《一桩罪行的始末》,第 43 页。

三、唯物史观的解释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明确反对用简单的循环论去刻画 1848 年法国革命的“下降”,即用古罗马帝国替代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去比附法兰西第二帝国替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马克思称之为“肤浅的历史对比”。因为古今社会基础的差别决定了表面循环背后历史机理的本质不同:“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存在这样的本质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间的共同点更多。”①但马克思也要处理“循环”和“下降”问题,即《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开篇所说的:“黑格尔在某处说过,历史总是出现两次。只是他忘了说,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一方面是法国革命自身在修辞上模仿先人,另一方面是现实的法国革命进程本身的“循环”和“下降”,1848 年这场不断“下降”的“闹剧”是对 1789 年法国大革命“正剧”的历史循环。

法国革命本身充斥着对先人的模仿:“1789—1795 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 1848 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拙劣地模仿 1789 年,时而模仿 1793—1795 年的革命传统。”在 1789 年,因为法国大革命是“前所未有的事务”,而承担这开创新纪元历史责任的资产阶级“缺乏英雄气概”,所以他们只好召唤古罗马的亡灵,通过在革命的外表和言辞上模仿他们来自我催眠,以此获得历史勇气去“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②。但 1848 年—1851 年的法国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法国的革命并没有在对 1789—1793 年革命的“模仿”中实现前进,而是出现了历史的倒退:“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时代。”③和 1789 年法国革命沿着一派比另一派更激进的上升路线不同,1848 年的法国革命“沿着下降的路线”进行,“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个挤着它们向前的党派,并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④ 这个怪圈中充满着各种颠倒,君主派的公开称号是“明日共和派”、保皇党是共和国元老、立宪派反对宪法、革命派拥护立宪、山岳党恪守议会秩序。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的分析去揭破了 1848 年法国革命怪圈之谜,这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的一个根本分析方法:到市民社会里去寻找政治国家的秘密,“在历史的斗争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他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⑤ 即从各个阶级的社会基础出发,而不是他们的政治自我意识出发,去理解它们在政治国家层面的活动,从“市民社会”出发理解“政治国家”这个颠倒的倒影。

现代国家制度的基础是市民社会,政治国家是其颠倒的抽象。而古典国家是实体性的共同体,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奴隶。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古今之变的关键差异所在,这种差别导致了所有对古典的模仿都是一种“闹剧”。马克思首先揭破二月革命不是一般政治哲学叙事中“共和反对王权”的革命,而是工业资产阶级反对金融资产阶级派别专政的革命。“七月王朝”是一个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王朝,但它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金融贵族”独占政权,不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完全被排斥在政权之外,而且其他资产阶级集团,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也被排斥在政权之外。金融资产阶级通过赤字、国债和赋税把王朝变成了盘剥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与工业资产阶级减少生产公共成本的诉求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65 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69—67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7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92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96 页。

直接矛盾。所以“宴会运动”的主要诉求是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王朝反对派要去推动选举改革,以扩大资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的独占统治。但是在“七月王朝”和“王朝反对派”的矛盾升级,使得事态迅速超越了“选举改革”的争议,“宴会运动”变成街头抗议、和平抗议升级为暴力冲突,卡皮西恩事件后革命无可避免地爆发,愤怒的工人武装迅速赶走了国王,占领了巴黎。

但是法国的工业资本主义还很不发达,这决定了无产阶级的不成熟。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独立地提出自己的革命主张,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既不是直接的、公开承认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想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已经到了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的地步”①。二月革命只是召唤出了“社会革命”的时代要求,却缺乏实现这一革命的历史条件——法国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铲除封建社会的物质根底,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此时聚集在巴黎的无产阶级只是力图在资产阶级利益旁边实现自己的革命利益,其结果就是在被武装起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镇压下去。

但镇压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什么也失败了呢?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共和派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派别,而是一个意识形态派别,它缺乏直接的市民社会基础。“它并不是一个因有某些重大的共同利益而紧密团结、因有特殊生产条件而独树一帜的资产阶级集团。它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师军官和官吏组成的派系。”②作为观念派别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仅有建立共和主义政权的单一主张,而没有市民社会利益集团的现实关系,所以它无法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统治体系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伴随镇压六月起义巩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任务完成,共和派就被“资产阶级群众所排斥”③,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市民社会基础是小店主等小资产阶级生产者。他们政治观念的特点是沉迷于抽象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追求民主反对特权。但他们只能抽象地理解“人民”:“把全体法国人,或至少是把大多数法国人看作具有同一利益和同一观点等等的公民。这即是他们的那种人民崇拜。”④他们不理解现实中真实的人民,是分裂成各个不同阶级并具有不同利益的。他们不去关注不同阶级的具体的现实利益,所以他们抽象而普遍的民主制主张无法表征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诉求,对无产阶级缺乏吸引力。他们自认为普遍地代表着全体人民,因此超脱于阶级的对抗之上,其实他们只是人数很少的“自由民”,因此他们力量是软弱的,不过是一个“过渡阶级”。面对现实中激烈的阶级斗争,他们只能将其归因为诡辩家把“统一的人民”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阵营。正是由于他们沉迷于政治的意识形态公式而与现实的人民脱节,使得由他们组成的“山岳党”只能抽象地栖身于议会政治之中,一旦离开了议会这个阵地,就失去了全部的力量来源。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无法占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领导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秘密在于“秩序党”,其真正的市民社会基础是波旁王朝的大地产和奥尔良王朝的金融贵族。此时的法国,工业资产阶级不是主流,社会最重要的集团力量是大地产和金融贵族。这两个保皇党虽然在其自我观念中是反对和憎恨共和制的,但是由于其市民社会基础早已资产阶级化,所以他们的政治统治必然以资产阶级最完备的统治形式——议会制共和国表现出来。“如果他们每一个集团分开看是保皇主义的,那么他们的化合物就必然是共和主义的。每个集团都只是为反对另一集团的复辟独霸意图而提出共同的统治,即提出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形式。”⑤“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真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9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7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87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65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98 页。

融合便是议会制共和国,在这一共和国中,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双方的色彩都陀罗丽,各类的资产者都消融为一般的资产者,消融为资产者这个类属了”①。所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立法会议阶段,是法国资产阶级的两个大集团的寡头统治时期。但由于资产阶级对自身的误解,在其社会基础、政治行为和政治言语之间呈现出断裂,而使得整个1848年后的法国政局愈发成“谜”。揭破其“谜局”的关键在于以唯物史观把握“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和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在历史的斗争中更应该把各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②这是唯物史观的历史祛魅和精神分析,即不能根据历史中各阶级的自我意识对历史加以把握,否则很难真正把握“时代的总的性质”,因为阶级的自我意识与其真实的社会存在之间,可能存在着错误甚至颠倒。但现实的利益运作,会迫使他们采取与实际经济利益相符合的政治行为。

但资产阶级面对共和制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纯粹的完备的统治形式”,却有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即“政治革命”为“社会革命”开辟了道路,政治解放赋予了社会解放以政治条件。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解除了“奴隶”的地位,成为自由人。他们将从“政治解放”所争取到的政治权利为出发点,继续向前推进到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解放”运动:“它通过普选权赋予政治权力的那些阶级,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者,正是它要永远保持其社会奴役地位的阶级。而它认可其就有社会权力的那个阶级,即资产阶级,却被它剥夺了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硬塞进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敌对阶级取得胜利,并危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宪法要求一方不要从政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要求另一方不要从社会的复辟后退到政治的复辟。”③这就是上文所说到的现代政治哲学内在的平等主义必然导向“社会革命”要求的矛盾。议会制共和国中的资产阶级要直面“社会革命”的强烈革命诉求,并且政治解放的一切工具都不再帮助其维持统治,反而威胁其统治:“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所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谓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可都是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④当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应对这种局面的时候,其就会选择放弃共和制。

资产阶级为什么放弃他们自己完备的统治形式——“议会共和制”,而选择路易·波拿巴的“帝国”?马克思用唯物史观揭破这个谜。“共和制虽然完成了他们的政治统治,同时却破坏着这一统治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现在必须面对各个被奴役的阶级并且直接和它们斗争,没有人调节,没有王冠作掩护,也不能用相互之间以及王权之间的次要斗争来转移全国的视线。由于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才不得不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缩下来,力图返回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为人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⑤这就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共和制不能稳定的阶级分析,即由于现代共和制及平等主义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政治解放走向社会解放,而资产阶级无法在共和制的框架内处理这一矛盾,所以资产阶级的统治总是从共和制向次一等的统治形式:向王权或帝国滑落,而这一滑落的终点就是波拿巴主义。资产阶级面对较大的“社会革命”压力时,会倾向于选择王权或帝国,以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7页。

渡自己的政治权力以保护自己的社会权力。

关于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马克思给出过他的几个社会基础:流氓无产阶级、小农阶级和军队。但这些都只是波拿巴夺取政权的支持力量,就其政治哲学本质来说,就是资产阶级最后的最丑陋的形式"帝国"。资产阶级的核心利益诉求在于其社会权力,即对其他阶层的经济统治和自身财富的不断增长。所以资产阶级共和制无法有效协调各种矛盾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就开始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国家即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要求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从事宣传和写作的分子,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以便巩固在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们私人的事情。"①现代国家制度的这种分裂:即作为政治国家成员的公民,与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私人之间的分裂,在作为统治阶级的法国资产阶级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②所以与其说路易·波拿巴是农民选出来的"家长似的恩人",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

恩格斯也曾指出波拿巴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早期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会出现的政治形式,资产阶级无法通过"议会制共和国"有效地协调阶级内在矛盾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又无法面对来自"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压力。所以他们放弃自己阶级的政治统治形式即议会制共和国,将统治权交给外在的独裁者,以换取自己的社会权利:"阻止他们互相厮打。这就是说它保护资产阶级不受工人的暴力进攻,鼓励两个阶级之间小规模的和平冲突,此外则不准它们有任何一点政治权力。"③

四、"公社"与"社会共和":一个古典的未来

"波拿巴主义"的帝国在政治哲学上是一个有趣的特例,它依然在"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现代国家一般性原则下运作,但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极大增强了"政治国家"的抽象性和独立性,它只是尊重和保护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需要的一般原则,但"政治国家"本身成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和实体,成为反过来宰制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外在强制性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分析拿破仑的第一帝国时就曾指出,拿破仑承认并保护现代国家中资产阶级社会顺利发展的物质基础,但与此同时,拿破仑把国家看做目的本身,而把市民生活仅仅看做"司库和他的不许有自己意志的下属","要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即商业和工业)同他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他就不再顾惜这些物质利益了"。所以波拿巴主义虽然承认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原则,但并不是资产阶级的直接政治统治:"内政方面,他也把资产阶级社会当作国家的对头来加以钳制,国家在他的心目中仍然是绝对的目的本身。"④

波拿巴主义打造出一个独立的并列于所有社会阶层,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国家"机器,"它通过摧毁议会权力亦即摧毁占有者阶级的直接政治权力而剥去了国家政权的直接的阶级专制的形式"⑤。托克维尔把握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之处,他意识到法国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产物,中央集权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⑥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制和贵族制的政治制度,但"他的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仍未倒下",它没有推翻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74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74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7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325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5 页。

⑥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75 页。

反而是从旧制度那里继承了中央集权制,并大大加强了它的独裁性。托克维尔对这种不受社会制约的中央集权制保持高度警惕:“共和政体如果是一个不受制衡机构监督的政府,它虽然可以许诺很多,但它给予人民的自由还不如君主立宪政体。”①这也导致了法国革命的不断循环:“人民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②托克维尔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更为古典的共和制,一方面在实现政治平等的同时,能弘扬公民精神使得民众摆脱对政府的依赖和而以更积极的公民意识参与政治;另一方面又能有效遏制共和制内部的“社会革命”冲动,可以能够遏制“危险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对法国的中央集权有着类似的分析,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任务是推翻特权使得法国全国公民的统一,所以法国大革命就将“专制君主制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并且增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和官吏的数目。而拿破仑的第一帝国完成了这个现代加强版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其在复辟王朝、七月王朝和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得到不断的发展,但官僚阶层还只是统治的工具。但到了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时期,官僚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相比,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巩固了自己的地位。”③马克思指出第二帝国“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 50 人的官吏大军和 50 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样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帝国是“现代国家制度”的极端形式,即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离结构中,政治国家的抽象性达到顶级的程度,与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共同体本位形成最极端的对立:“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刻脱离社会而作为一种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④

法兰西第二帝国这个怪胎的出现,使得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叙事在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的进阶之外,还要新增“社会的解放”的维度,即将社会共同体除了破除内在等级和经济极权实现社会平等之外,社会本身也要从变型后的政治国家——帝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将法兰西第二帝国称为“国家政权最后的、最高的表现”,帝国是旧社会政府权力最后的、最完备的形式,它与社会本身相分离并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独立于社会而且与社会对立的利益。它摆脱了市民社会中和阶级基础的控制,甚至可以践踏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处理政体形式本身的循环或下降,而在于批判“政治国家”这种抽象本身,“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而是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怪胎”。⑤

1871 年,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戏剧性的轰然崩塌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仓促成立的间隙中崛起的巴黎公社身上,马克思找到了“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公社。公社这一“帝国的直接对立物”的政制形式,并不是绝对全新的现代革命形式。公社与帝国的对抗,如果不至于追溯到公元前 5 世纪的希波战争——雅典城邦联盟与波斯帝国的对抗,至少也可追溯到公元前 4 世纪雅典城邦制对马其顿帝国的抵抗,尤其是作为马其顿帝国皇帝亚历山大老师的亚里士多德坚持在《政治学》中将城邦推崇为最优的政体,可见西方知识传统对帝国体制的内在抵制。这一抵制在中世纪表现为欧洲的“共和城市”,遍及意大利、荷兰、法兰西南部和北部以及德意志部分地区的城市自治运动被称之为“公社运动”,这些自治的城市被称为“公社”(commune)⑥。当然这些中世纪公社大多是寡头制的而非民主制的,由大家族控制着城市的执政权,与马克思所描述的作为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的“公社”有着本质区别。

---

① 托克维尔:《托尔维尔回忆录》,第 254 页。

②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24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761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760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8 页。

⑥ 塞缪尔·E. 芬纳,《统治史(卷二):中世纪的帝国统治和代议制的兴起——从拜占庭到威尼斯》,王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63 页。

马克思将“公社”称为“社会共和国”,“共和国只有公开宣布为社会共和国才可能存在”。① “社会共和”超越“政治共和”的关键就是完成了“社会解放”和“社会的解放”双重任务。一方面“社会共和”以共和的原则废除了市民社会的“内部等级制”;另一方面其作为帝国的“直接对立物”,是反对帝国机器存在条件的“革命的积极形式”,废除了抽象的政治国家特别是其最高形式——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这标志着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充满生气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因此马克思以废除中央集权的“社会共和”作为破除法国共和制面临的革命循环和下降、帝国与僭主怪圈的政治哲学方案。

古典的“循环”在现代革命的进步主义叙事中最终被解释为一种“螺旋上升”,即用革命的历史辩证法去阐释“循环”和“下降”难题。虽然古今政治哲学在诸多问题上各持一端,但无论是古典的柏拉图,还是现代的马克思都将僭主制看做最败坏的政体,哲学也总试图为现实谋划一种理想政制。不过叙拉古之于柏拉图的尴尬,马克思恩格斯对波拿巴政权必然短寿的判断,以及之后数十年中每次危机时对波拿巴即将终结的热烈期盼,都折射出政治哲学面对现实政治时的限度。在哲学与城邦的关系中,哲学并不能绝对整全的理解城邦,城邦总有其无法把握的“剩余”现实。

Circulation, Descent, and Tyranny: Political-Philosophical Criticism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1848

Wang Zhiqiang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Pres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6, *China*)

Abstract: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revolution” (革命) was the ceaseless circulation of celestial bodies, but its modern meaning is exactly opposite to its classical meaning. Modern revolution is the “endpoint” at which the past history is subverted,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the “starting point” at which a new era is created. It also implies a historical movement that constantly advances towards the future. But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1848 experienced a political cycle of continuous “descent” (下降) and “circulation” (循环). The question that “Why the emergence of the Second Empire of France (法兰西第二帝国) made republic possible in Europe” became an epochal issue, which European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had to deal with. Observing this issue in the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contexts of the changes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we can find the invers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republican spirit from “mixing” and “balance” to “virtue” and “equality”, and then to “radicalism” and “terror”, which presented a richer theoretical tension. The appeal for egalitarianism and “social revolution” inherent in modern republic was its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Marx and Engels worked hard to uncover the myste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1848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sought for a more ideal political system for human emancipation. The key to the transcendence of “social republic” over “political republic” was to fulfill the dual tasks of “social liberation” and “ liberation of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the “internal hierarchical system” of civic society was abolished,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litical state, especially its highest form — the centralized imperial system, was also abolished. Marx used “social republic” as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solution to breaking through the cycle of revolutionary circulation and descent, as well as the cycle of empire and tyranny with which the French republic was confronted.

Key words: French revolution in 1848; changes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social revolution; social republic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50 页。